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史略 (1930—1948)

吴友法, 车 英

(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友法 (1948—), 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德国史及编辑学研究;
车 英 (1954—), 男, 河北望都人,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主要从事国际新闻传播学、国际私法学及编辑学研究。

[摘 要]《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学报之一, 在我国学报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以 1930 年正式创办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始, 至今已有整整 70 年的历史。探寻武汉大学学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足迹, 总结武汉大学学报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对于办好今天的武汉大学学报, 繁荣武汉大学的学术事业, 促进武汉大学的教学和科研, 以及对于了解我国学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季刊; 文哲季刊; 历史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5-0581-06

高等学校学报主要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学成果为主的高层次的综合型学术理论刊物, 也是检阅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学术水平的一个窗口。它在我国期刊杂志中处于一种重要的特殊地位。创办和办好学报历来为高等学府所重视。

中国大学学报是伴随着近代中国高等学府的创办而兴起的, 至今已走过了 80 年的历史。

武汉大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高等学府之一, 其最早前身是清末洋务派的著名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于 1893 年 (光绪十九年) 在武昌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 与天津大学前身天津西学学堂 (1897 年)、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 (1897 年) 同属近代我国创办最早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堂之一^[1] (第 1 页)。

武汉大学自自强学堂始, 几经更名: 方言学堂 (1902 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1913 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3 年)、国立武昌大学 (1924 年)、

武昌中山大学 (1926 年)、国立武汉大学 (1928 年), 历经风风雨雨。在 100 多年的历史中, 这所名扬中外的大学府为中华民族培养了 10 余万名高级人材, 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从这里走向全国及世界各地。武汉大学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 作为其学术理论刊物的《武汉大学学报》, 为促进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学术事业的发展, 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武汉大学学报》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学报之一, 在我国学报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以 1930 年正式创办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始, 至今已有整整 70 年的历史。探寻《武汉大学学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足迹, 总结《武汉大学学报》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对于办好今天的《武汉大学学报》, 繁荣武汉大学的学术事业, 促进武汉大学的教学和科研, 不是无所裨益的。同时, 对于了解我国学报产生和发展的历

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

国立武汉大学是在辛亥革命后疾风暴雨的年代里诞生的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清政府,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旧文化,重视教育、崇尚民主与科学的风尚开始形成。为适应培养当时极其缺乏的师资人材的需要,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自强学堂原址及原有基础上,于1913年7月宣告成立。武昌高师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广州高师一起,成为当时最著名的4所国立高师。从自强学堂演变到国立武昌高师,一所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逐步形成。随着形势的发展,武昌高师几经更名。1923年9月,全国实行修改学制的措施,为提高学校规格和教育质量,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秋天,又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由一所师范院校变成一所普通大学。1926年秋天,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三镇,武汉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武汉国民政府对教育进行了整顿,于1926年12月将武昌大学、医科大学、商科大学、法科大学、文华大学等5校合并组成为武昌中山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是进步力量控制的一所革命学校,在学校共产党和团组织领导下,学生的革命活动十分积极、活跃。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追随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反动势力镇压下,武昌中山大学于12月底被迫解散,华中重镇武汉一时出现了大学教育的空白。1928年初,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先生首先提议在武汉恢复重建一所新的大学。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蔡元培、胡适、王世杰、李四光、周鲠生、王星拱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赞成和支持。当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重新组建国立武汉大学。

在国立武汉大学组建以前,由于处于创立和探索阶段,办学方向、教育体制、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尚未趋稳定,创办一种综合性的纯学术理论刊物也还未提上日程。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学校的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活跃,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如史地学会、教育学术研究会、英语谈话会、数理学会、理学会等。学校也编辑出版了几种杂志,如1918年6月创刊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周报》《教育学术研究会杂志》《博物学杂志》《数理学会杂志》,“五四”前夕出版的《新空气》杂志等。这些杂志在新思潮影响下,注重刊登进步思

想、文化的文章。在第13期《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周报》上,刊登了一位教师在欢送一位外籍教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位教师满怀激情地指出:“中国少年将轰轰烈烈震动世界之耳目矣。盖其国非徒有致强之资格已也,而确有致强之实力也。其进步之速将駸駸与时俱长也。今虽有党争纷驰,含垢未伸,然终必有扩张其国威,起与烈强并驾之一日也”。对中国青少年寄予厚望。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之情溢于言表。武昌高师博物部学生程准在《新空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抨击了封建的旧道德观念,提出了“孝子并不一定要忠君”的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此遭受反动军阀王占元的逮捕。这些刊物尽管还不是纯学术的理论刊物,但对现实问题颇为关注,在宣传进步的思想和文化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在从事紧张的校舍、图书设备建设和教学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教学和科研,从1930年起创办了《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下文简称《社会科学季刊》)、《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下文简称《文哲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三种学术理论刊物。此外,还编辑出版了《武汉大学丛书》《珞珈山月刊》等。《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的编辑出版,可视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前身,是学校重视学术研究的标志。

国立武汉大学的办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第一任校长王世杰指出,要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大学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学术,一在促进高深学术”,认为大学是承担教学和科研“两种使命”^[2](第1版)。《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的创办,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实施。王世杰对创办《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十分重视,亲自撰写《创刊辩言》。他在《创刊辩言》中首先着重强调刊物的质量,认为“学术期刊可以看做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从刊物的内容,“可以窥见一国文化的质负”;从刊物的种数或销行数额,“可以窥见一国文化,在量的方面,已经到达的程度”。其次,他认为促进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是“鉴赏与批评”,而“学术期刊是鉴赏与批评的媒介”。第三,他要求把两刊办成“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不但本校同仁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也就是说,办好一流学校,就要办好一流学术刊物;要使武汉大学办的这些刊物,不仅反映本校学术水平,而且要反映全国学术界的水平。

二

《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为学术性季刊,每年3、6、9、12月出版。文章付排前一律用季刊委员会统一稿纸誊写,统一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篇幅不定,一般为220页左右,约12万字;标题目录、正文全部用4号字体,一律直排;文字之间疏密得当,给人以清晰、醒目之感;每期均发行800份。两刊出版印刷费全“由本校经费项下支付”。

《社会科学季刊》主要刊登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文章。每期辟有“论著”、“特载”、“新书介绍与批评”等栏目。创刊号发表了王世杰《创刊辩言》之外,还发表了张奚若、钱端升、周鲠生、刘秉麟、燕树棠、杨端六、葛扬焕、宗贤俊、梁明致等人的文章。《文哲季刊》主要刊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心理学及史学方面的文章,辟有“论著”、“特载”、“书评”等栏目。创刊号同样发表了王世杰的《创刊辩言》,另外发表了高翰、胡适、游国恩、刘隰、闻一多、郭绍虞、谭戒甫、陈西滢、朱东润、李笠、叶德辉、周贞亮等人文章。

《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均设季刊委员会,由校长聘任本校教员若干人组成,并指定委员会一人为编辑主任。委员会开会由编辑主任负责召集,并以编辑主任为主席。委员会负责审查稿件、决定稿费、保管存款及审议其他关于季刊出版事宜。委员会委员除分期承担撰写论文外,每期有写作书评的义务。

《社会科学季刊》刊登本校教员稿件由法学院院长和编辑主任共同负责征集;《文哲季刊》所需本校教员稿件由文学院院长与编辑主任共同征集。两刊均函聘校外学者为“特约撰述员”。“特约撰述员”分期担任撰述论文任务,还负有随时撰写书评的义务。其稿件登载与否,由季刊委员会酌定。每期季刊给“特约撰述员”赠送一本。

凡刊登的稿件,属论著之类,无论是本校教员,还是校外学者,一律致送稿费,其标准“依文稿之性质及篇幅之长短分别致送”。列入特载及书评栏目的稿件,支付稿酬与否,视其“性质及篇幅之长短临时决定之”。刊登“特约撰述员”“稿件按规定从优致送稿费”。

《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从1930年创刊至1949年,经历了两个时期。1930年至1937年为第一个时期。在这期间,《社会科学季刊》共出7卷,每卷4期,共28期;《文哲季刊》共出6卷,每卷4期,共24期。这个时期两刊的出版比较稳定,没有中

断。刊登的文章占解放前两刊总文章97%,是解放前两刊兴旺的鼎盛时期。1938年至1948年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局势动荡,经济拮据,两刊频于萎缩,处于停顿的状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武汉沦陷前的1938年4月,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两刊因此被迫停刊。1943年,《社会科学季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复刊。《复刊辩言》指出:“民国26年,抗战爆发,不久,武大西迁,以物质的简陋,及经费的支绌,本刊暂停出版,瞬历5年。在此5年中,学术界人士生活的艰苦与年俱增,但‘集合的研究’需要的感觉,却亦与年俱增,本刊得改于今日复刊,想为学术界人士所乐闻”^[3](第1页)。复刊后的《社会科学季刊》卷期续前,为第8卷,遗憾的是只出了1期。抗日战争胜利后,4年内战的烽火燃起,因经费困难,再次停刊。1948年,武大迁回武昌,《社会科学季刊》再度复刊,也只出了1期,卷期续前为第9卷。这最后一期刊登的有周鲠生、李剑农、韩德培、吴于廑、唐长孺等人撰写的文章。《文哲季刊》先于《社会科学季刊》于1940年在乐山复刊,至1948年也只出了1卷,共3期,卷期续前为第7卷。从第7卷第3期起,《文哲季刊》改名为《文哲学报》。这一期刊登的有程笃原、刘异两位先生的遗著,以及徐天闵、方壮猷、刘永济、刘学章等人写的文章。

武汉大学迁回武昌后的1948年,《社会科学季刊》委员会由刘涤源、姚梅镇、谭崇台、周新民、曹绍濂等人组成,刘涤源为主任委员;《文哲季刊》委员会由洪谦、刘隰、程会昌(千帆)、周煦良、唐长孺、周辅成、吴宓等人组成,洪谦为主任委员。

从创刊至1948年,《社会科学季刊》出9卷,共30期;《文哲季刊》出7卷,共27期。《社会科学季刊》发表论著166篇(含连载续篇)、特载50篇(含连载续篇)、书评153篇,共计369篇,其中法律学论著82篇、政治学论著56篇、经济学论著58篇、其他内容5篇。《文哲季刊》发表论著176篇(含连载续篇)、特载15篇(含连载续篇)、书评49篇,共计240篇,其中文学论著(含外国文学、文字学)71篇、历史学论著(含校勘、考证)40篇、哲学(含心理学)37篇、其他论著7篇。从内容上看,两刊发表的文章以法律、文学为最多,其次是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

三

纵观《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我们认为,两刊刊登的文章内容有以下特色:

1. 以刊载学术论著为主

从两刊创刊一开始,这一指导思想就十分明确

1943 年《复刊辩言》再次指出:“本刊为纯粹学术期刊”。两刊每期所刊载的学术论著大约占总篇幅的 80%。只要有学术价值,不论文章长短均可刊载。刊载的论著中绝大部分都是长文,有的长篇论著分期刊载。如《文哲季刊》第 1 卷第 1 期发表的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连载 4 期,长达 3 万字;《文哲季刊》第 3 卷第 4 期发表的谭戒甫的《校吕遗谊》分 4 期连载,近 5 万字,亦属专著。类似这样的文章还有不少。《社会科学季刊》发表连载文章约有 14 篇,《文哲季刊》发表连载文章约有 27 篇。学术性是高校学报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两刊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2. 注重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

《社会科学季刊》的《创刊辩言》明确指出:“学术的进展,其条件诚不一而足,然众多条件之中,鉴赏与批评可以说是基本的条件。学术期刊就是鉴赏与批评的媒介。学术期刊的存在可使从事某种学问的人,以其创作或创见,陈诸从事于同一学者之前而供其鉴赏或批评。而凡从事于同一学问者,并得采取鉴赏者批评者之见地,立为新的研究之基础,以企图新的成果。由是,一切学术上的研究,乃必然成为一种‘集合的研究’,其进展之度自非单纯的个人研究所能比拟。因为人类本无所谓超人,脱离群力——即脱离外来的鼓舞与外来的纠正——任何个人,在科学上或艺术上,决难有伟大的成就,这就是鉴赏与批评所以成为学术进展的基本条件的原因”^[41](第 1 页)。《复刊辩言》又再次强调了这一使命:“为在社会科学范围内,为鉴赏与批评的媒介,使从事于社会科学的人士,得为‘集合的研究’,而促进社会科学学术的进展。”为此,从创刊以来,“始终勤谨从事,毫无间断”^[41](第 1 页)。《文哲季刊》第 1 卷第 1 期发表的《文学批评的一个新基础》一文指出:“批评在中国没有成一件东西,在欧洲,也只有一个建筑在散沙上的系统。批评的原则是专为人破坏而设的,批评家的定论只成人笑话的资料”,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是对批评意义的曲解;强调批评家是“费尽了披沙淘金的功夫”,“找到些精密的思想,透彻的见解,发人深省,引人入胜的一言半语,这就是批评家的贡献”;并指出“批评的基础便是心理学”,“价值是批评的中心问题”。虽然两刊发表的争鸣、批评论著不多,但十分强调批评对促进社会科学事业的伟大作用,却是难能可贵的。

3. 刊登名家学者撰写的论著较多

《社会科学季刊》刊登了王世杰 4 篇、张系若 4

篇、周鲠生 68 篇、钱端升 9 篇、刘秉麟 10 篇、燕树棠 6 篇、杨端六 19 篇、李剑农 3 篇、刘迺诚 13 篇、吴学义 11 篇;《文哲季刊》刊登的有闻一多 2 篇(其中 1 篇连载 4 期)、胡适 2 篇、郭绍虞 1 篇、朱东润 14 篇、谭戒甫 22 篇、刘颐(刘博平) 3 篇、刘永济 12 篇、郭斌佳 19 篇、陈恭禄 9 篇、范寿康 4 篇(以上统计的篇数均包括书评文章)。

4. 《社会科学季刊》刊登少量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

这方面文章首先是经济方面内容,如针对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中国“银价大跌,对外汇兑益逆,外债赔偿,吃亏益甚,洋货价值日腾”的情况,第 1 卷第 1 期的特载栏目专门刊登“关于银价跌落问题之讨论”,发表了梁明致写的《银价跌落与中国币制问题》和杨端六写的《银价跌落与中国政府和责任》两篇文章。文章认为要克服银价下跌,必须进行币制改革,要“把海关金单位扩大为全国计算标准,不应固守银本位”,提出“以海关金单位做基础,去‘理银币’,即‘废两改元’”;指出“币制改革是一个极困难的问题,但关键是‘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施行政治上和财政、金融上的方策。要是没有这样一个中央政府,不仅对外的货币政策不能实行,就是整理国内的币制,也是做不到的’”。另外,在第 1 卷其他几期又接连发表了 7 篇有关财政问题、银价下跌、币制改革方面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为国民党政府如何稳定财政金融出谋献策。其次是对外关系方面内容,如 1932 年 9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为了驳斥对“伪满洲国不承认主义之维持挟疑问”,周鲠生教授写了《所谓伪满洲国之承认问题》一文,发表在《社会科学季刊》第 5 卷第 1 期上。文章运用法律手段围绕对“伪满洲国承认问题”,从“一般国际法原则”、“国际协定”、“国联决议”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认为承认伪满洲国是违法的,不承认伪满洲国在法律上是天经地义的,很有说服力。在两刊发表的论文中,研究现实问题文章所占地例比较小。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思想文化领域控制得很严,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文章几乎没有。

5. 刊登不少介绍社会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方面的文章

《社会科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的《苏联联邦制度的研究》(西遐著)一文,从“苏联宪法的产生经过”、“联邦的构成”、“联邦的中央机关”、“各民族和联邦中央的关系”、“中央各最高机关的权限”、“各邦的一般法律地位”、“各邦政府的构造”、“各邦对中央政府活动的参与”等方面,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制度作了全面分析介绍。第5卷第3期发表的《苏联政治制度特征》(张国安著)一文,从“苏维埃代表大会”、“民族政策”、“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三权鼎立的“权力统一制”、“监视制度”、“选民监督权”、“选举制度”、“国家政策”等方面介绍分析了苏联政治制度特性。本文还引用了斯大林有关苏维埃问题的论述,即“苏维埃是被压迫阶级夺取政权的利器”,“苏维埃是教导民众革命的组合”,“苏维埃是为了一国际大联合,以解放弱小民族及建筑劳工国际为目的”,“苏维埃是综合立法、行政于一体,采用职业代表制及训练劳工民众共同参政的制度”。第7卷第3期发表的《苏联新宪法》(钱端升著)详细介绍了1924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和1936年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宪法产生的经过及详细内容。该文还介绍了列宁在1921年为了使苏联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文中写道:“所谓新经济政策者即对于农产品不采取征收的方法,于工商企业则在相当限度内容许私人经营,而货币及工资薪给亦一体恢复之”^[5](第530页)。其他文章,如第2卷第4期发表的《苏俄之设计经济》(刘秉麟著)、第3卷第3期发表的《苏俄信用制度》(刘秉麟著)、第6卷第2期、第3期发表的《苏联的劳工政策》(陶因著)、第4卷第4期发表的《苏俄的土地政策》(陶因著)、《苏俄革命法院之历史及组织》(梅汝璈著)等文,介绍了苏联经济制度、政策、法律等问题。这在处于国民党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文章对于国统区人民了解社会主义苏联、宣传进步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6. 两刊都十分重视刊登书评文章

《社会科学季刊》几乎每期都辟有:“新书介绍与批评”栏目;《文哲季刊》几乎每期辟有“书评”栏目。《社会科学季刊》共发表书评158篇,占总文章篇数的41.2%;《文哲季刊》发表书评49篇,占总文章篇数的20.4%。周鯨生校长十分重视书评,他带头撰写,在《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的153篇书评中,他一人独撰了37篇,占总篇数的24%。“季刊规则”中还明文规定“季刊委员会”委员“每期有作书评之义务”。在这些书评文章中,《社会科学季刊》几乎全部刊登的是评介国外出版的新书,《文哲季刊》大部分也是评介国外出版的新书。评介中国出版的著作文章不多,大约只占27%。

两刊发表的书评文章比较活泼,长的几千字,短的只有几百字。评介的内容注重学术性、探讨性、批评性,不完全是溢美之词。在肯定优点的前提下,用切磋商讨的口气,指出其不足之处,然后进行探讨。

不像今天有的书评文章那样对不足之处只用短短几笔,稍作点缀。《文哲季刊》第3卷第3期发表了郭斌佳写的评《欧化东渐史》(张星烺著)的文章,在肯定该书之后,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其中指出本书把物质与思想文明分割,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该书使读者感到一种错误印象,“好像欧化传入的时候就是这么分门别类的”,认为“欧化是一个整个的东西”,“文化上的影响与政治是很难分开的”,“欧化东渐”是“欧人东来,毕竟是帝国主义侵入远东的运动”,“社会上发生的变化,都可以推源到这个运动”。还指出该书对中西文化“不加是非”是不对的,认为“这两种文化的原素和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东西文化的冲突,实在是世界史上一个极大的运动,而因为今后的出路都靠着这两种力量冲突的结果,我们更觉得这是我们当前最重大的问题”。这与其说是一篇书评,不如说是一篇学术上互相切磋、互相探讨的论文。这种书评的风格是值得赞赏、提倡的,与今天某些书评先说好的而后十分做作地说上几句不足之处的格调迥然不同。

《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所发表的书评文章,大量介绍国外学术论著,这对交流学术信息、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吸收国外有益的学术成果,通过批评,对不足之处引以为戒,对促进学校学术发展、活跃学术空气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重视书评,开展探讨性的批评是《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的一个很重要特色,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7. 《文哲季刊》还刊载少量译文

《文哲季刊》第3卷第1期发表胡稼怡翻译的Jared S. Moore撰写的《自我问题》,第3卷第4期发表王凤岗翻译的J. K. Norton撰写的《美国课程编制的新趋势》,第6卷第2期发表方重翻译的A. A. W. Ramsay撰写的《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等,这方面文章有10篇左右。

另外,《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每卷后面都有一个专题总目录,把该卷刊载的文章分专题刊出,这样查起来十分方便。

《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的编辑出版,使《武汉大学学报》初具规模,为解放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出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上的不民主、文化思想领域的封闭性及整个学术界的空气沉闷,使两刊发展受到限制,加之艰苦的8年抗日战争和4年内战,《社会科学季刊》和《文哲季刊》未能连续出版,中断多年。

不谓不是一桩憾事。

随着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大学获得了新生,从而为《武汉大学学报》的新生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条件。

[参 考 文 献]

- [1] 刘佛年.序[A].吴贻谷.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2] 王世杰.谈办学思路[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29-

05-27

- [3] 编委会.复刊辩言[J].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3,8(1).
[4] 王世杰.创刊辩言[J].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1(1).
[5] 钱端升.苏联新宪法[J].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4,5(3).

(责任编辑 叶娟丽)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in 1930- 1948

WU You-fa, CHE Ying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WU You-fa(194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German history and editing; CHE Ying (195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editing.

Abstract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started in 1930 and named Wuh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 Wuh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Quarterl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cademic periodicals in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which has the history of 70 years. Looking for the historic steps and summing up the exper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is of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in making this academic periodical even better, making the academic fields of Wuhan University even flourishing, promoting the teaching & researching forward, and grasping the developing lines of the academic periodicals in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Key words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Humanities Quarterly; history